

# 超越“欧盟中心主义”：全球南方地区主义研究的进展\*

耿协峰 陈灵芝

**内容提要：**在地区主义研究领域，“欧盟中心主义”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但在当前全球南方崛起的新形势下，这种思想传统受到学术界多重挑战。无论是运用于全球南方的、立足于全球南方的还是对比于全球南方的，全球南方地区主义研究均取得了突出进展。从历史比较的角度来看，全球南方地区主义研究的进展经历旧地区主义时期、新地区主义时期和比较地区主义时期三个历史阶段，逐步突破传统欧洲一体化理论桎梏，立足于全球南方构建自主性知识体系，并不断推动全球比较研究实现从“模型化”到“模板化”再到“多样化”的范式转型。总之，全球南方地区主义研究通过批判性借鉴欧洲一体化理论，深化本土解释并创新比较方法，逐步超越“欧盟中心主义”，努力形成强调自主性、多样性的知识体系，并为真正的地区主义全球比较研究注入新活力。

**关键词：**“欧盟中心主义” 全球南方 比较地区主义 欧洲一体化 地区自主性

## 一 引言

长期以来，围绕欧洲一体化或欧盟进程构建的相关理论被视为国际关系学中地区主义研究的样板或模版，<sup>①</sup>甚至“一定程度上被奉为其余地区一体化实践的理论坐标”，<sup>②</sup>由此，在地区主义研究领域形成了鲜明的“欧盟中心主义”思想传统。具体而言，这种“欧盟中心主义”在理论文献中的体现即是，“用主要来自欧盟制度与进程中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比较地区主义视角下中国参与‘全球南方’地区合作研究”（项目编号：23AGJ006）的阶段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修改建议，文责自负。

① Tanja A. Börzel and Thomas Risse, “Diffusing (inter-) Regionalism: The EU as A Model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KFG Working Paper Series, No.7, 2009, p.9.

② 王晨星：《欧洲区域一体化理论适用性探讨》，《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1月14日，第A05版。

的标准去衡量其他地区主义,而忽视地区主义其他的可能发展途径,并拒绝按照其他地区自己设定的目标来看待其发展成就”。<sup>①</sup>在当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的背景下,这种认识上的偏颇日益受到质疑,其可持续性受到多重挑战。国际学术界已开始呼吁“超越欧盟中心主义”,致力于推动“真正的比较地区主义”研究议程。<sup>②</sup>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文献以“南方地区主义”(Southern Regionalisms)、“全球南方地区主义”(Regionalism in the Global South or Global South Regionalism)等为主题或关键词,将全球南方的地区和地区间合作置于地区主义研究下进行考察。<sup>③</sup>

截至目前,已有相当多的学术文献从不同角度对欧洲一体化相关理论的演进做出评析,<sup>④</sup>但鲜有研究者从超越“欧盟中心主义”的视角出发,对全球南方地区主义研究的学术进展做出比较性评估。索德鲍姆(Fredrik Söderbaum)虽然按照时间顺序全面梳理了地区主义的研究历史和学术进展,但他主要强调的是人们在地区主义理论认识上的新旧更替;<sup>⑤</sup>阿查亚(Amitav Acharya)虽然鲜明地提出了“超越欧盟中心主义”的学术任务,深刻指出在欧盟之外广泛存在地区主义的“多重全球传统”,并比较了欧洲和欧洲之外地区主义理论的异同特征,但并未从学术史角度系统梳理国际学术界是如何一步步超越“欧盟中心主义”的。有鉴于此,本文尝试根据索德鲍姆的历史分期法,将全球南方地区主义研究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旧地区主义研究时期(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新地区主义研究时期(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与比较地区主义研究时期(21世纪头十年中期至今),并在全面评估全球南方地区主义研究学术进展的同时,努力践行阿查亚提出的“超越欧盟中心主义”的学术目标。

① [德]塔尼亚·A.博泽尔、[德]托马斯·里塞主编:《牛津比较地区主义手册》,耿协峰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04页。

② [加拿大]阿米塔·阿查亚:《超越欧盟中心主义的地区主义》,载[德]塔尼亚·A.博泽尔、[德]托马斯·里塞主编:《牛津比较地区主义手册》,第104-120页。

③ 耿协峰、陈灵芝:《21世纪以来中国的地区主义研究——耿协峰教授访谈》,载《国际政治研究》,2024年第4期,第151页。

④ 21世纪以来,中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欧洲一体化相关理论的演进作出过评析,参见房乐宪:《政府间主义与欧洲一体化》,载《欧洲》,2002年第1期,第81-90页;王学东:《新制度主义的欧洲一体化理论述评》,载《欧洲研究》,2003年第5期,第81-91页;Ben Rosamond,“The Political Science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Disciplinary History and EU Studies,” in Knud Erik Jørgensen, Mark A. Pollack and Ben Rosamond, eds., *Handbook of European Union Politics*, Sage Publications, 2007, pp.7-30;李明明:《后功能主义理论与欧洲一体化》,载《欧洲研究》,2009年第4期,第33-45页;宋新宁:《欧洲一体化理论:在实践中丰富与发展》,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第2-9页;赵晨:《欧盟政治研究:政治理论史的视角》,载《国际政治研究》,2016年第6期,第64-80页;贾文华:《探寻主导研究议程的元问题与理论核心问题——欧洲一体化理论繁衍的历时与共时考察》,载《欧洲研究》,2018年第3期,第135-154页;Ian Manners and Ben Rosamond,“A Different Europe is Possible: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EU Studies and the Dilemmas of Integr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56, No.S1, 2018, pp.28-38;贺之杲:《欧洲一体化研究:西方叙事与中国视角》,载《欧洲研究》,2023年第5期,第119-145页。

⑤ [瑞典]弗雷德里克·索德鲍姆:《旧地区主义、新地区主义和比较地区主义:研究历史与学术进展》,载[德]塔尼亚·A.博泽尔、[德]托马斯·里塞主编:《牛津比较地区主义手册》,第15-30页。

本文的主要研究问题是:国际学术界在不同时期研究和解释全球南方地区主义的学术文献中,无论来自西方还是非西方学者,是如何体现又如何超越“欧盟中心主义”思想传统的?此外,相关学术文献中最为突出的比较研究,主要是对欧盟与全球南方地区主义进行的比较研究,又如何发展并体现对“欧盟中心主义”的超越?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称的“全球南方地区主义研究”包含三方面含义:运用于全球南方的、立足于全球南方的和对比于全球南方的所有相关学术研究。因此,所涉及文献也相应包含三方面:其一是将西方(或欧洲)地区一体化理论成果运用于解释全球南方地区主义实践而产生的学术文献(主要是西方学者,也有部分南方学者的贡献);其二是立足于全球南方本土地区主义经验而试图加以解释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南方学者,也有部分西方学者的贡献);其三是相较于全球南方而进行的地区主义比较研究成果(既包括欧洲与南方的比较,也包括南方内部跨地区的比较)。

## 二 旧地区主义研究时期

旧地区主义在全球南方可以追溯到很早时期(索德鲍姆对此又划分出“早期地区主义”阶段<sup>①</sup>),例如,在亚洲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先秦时期,或者追溯到古代中华朝贡秩序正式确立的明清时期(1368—1840年)<sup>②</sup>,至少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泛亚主义”思潮兴起时;在拉美,至少可以追溯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拉美独立战争时期(也就是“泛美主义”思潮兴起时);在非洲,也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泛非主义”兴起时。不过,现代国家有意识地进行地区主义活动并且学术界对之开展研究,主要还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的。因此,本文的梳理评估也从二战后的旧地区主义及其研究成果入手。

通常认为,二战后的地区主义活动集中在西欧,以西欧一体化为发展主线,但实际上在亚非拉地区也早有开展,尤其体现在1945年成立的阿拉伯国家联盟(LAS)和1948年成立的美洲国家组织(OAS)身上。尽管如此,1951—1952年欧洲煤钢共同体(ECSC)的成立才真正激发起人们对于地区主义理论研究的兴趣。20世纪50—60年代西欧地区一体化的发展,催生了新功能主义、政府间主义等许多具有重大影响的理论。这些理论

<sup>①</sup> [瑞典]弗雷德里克·索德鲍姆:《旧地区主义、新地区主义和比较地区主义:研究历史与学术进展》,第17页。

<sup>②</sup> David C. Kang, *East Asia Before the West: Five Centuries of Trade and Tribut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虽以西欧一体化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但自 20 世纪 60 年代始,学术界也出现了运用它们来解释欧洲以外地区主义发展的研究趋势。<sup>①</sup> 总体来看,当时的全球南方地区主义研究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的进展:一是直接运用欧洲一体化的现有理论去解释南方地区主义,但频频受挫;二是基于南方地区本土特征进行的初步理论探索;三是将欧洲与南方地区放在一起开展的模型化比较研究。下面我们分别予以考察。

### (一) 欧洲一体化理论的运用受挫

旧地区主义时期,国际学术界首先围绕西欧一体化活动构建起一系列描述性或解释性的理论,包括联邦主义、功能主义、安全共同体理论、新功能主义等,有学者统称为“地区一体化的古典理论”。<sup>②</sup> 起初,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最主要的地区一体化学者如哈斯(Ernst B. Haas)认为,虽然欧洲一体化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其他地区与欧洲在环境因素(社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意识形态等)以及制度架构和功能需求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比如阿拉伯世界缺乏欧洲那样的多元社会结构和经济基础,其一体化进程面临诸多阻碍),所以欧洲一体化理论难以直接照搬或复制到其他地区。<sup>③</sup> 然而,随着欧洲一体化理论在国际学术界的传播,还是有不少学者(包括哈斯本人)试图对欧洲之外的其他地区进行同理思考,运用这些古典理论去解释其他地区的一体化活动。

例如,哈斯和施密特(Philippe C. Schmitter)曾试图将他们的理论应用于拉丁美洲,考察拉丁美洲国家在经济一体化方面的多边合作努力,特别是对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协会(LAFTA)的发展前景进行分析,看其能否从经济领域外溢至政治安全领域,即能否从一个自由贸易区向某种形式的政治联盟过渡。<sup>④</sup> 虽然在这项研究中,他们认为,拉丁美洲一体化的未来发展既可能出现停滞,也可能通过间接功能扩张和利用不平衡发展实现一体化,但是,后来很快发现,这样的研究与现实情况存在脱节。哈斯本人就承认,“[新功能主义]在第三世界的适用性……仅仅在于它准确地预测了地区一体化

<sup>①</sup> Charles Pentland, “The Region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 Concepts and Evide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30, No.4, 1975, pp.599-630.

<sup>②</sup> Andrew Moravcsik, “Integration Theory,” in Desmond Dinan, ed., *Encyclopedia of the European Union* (Updated Editi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8, pp.280-291; 转引自宋新宁:《欧洲一体化理论:在实践中丰富与发展》,第 8 页。

<sup>③</sup> Ernst B. Haas,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 The European and the Universal Proces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15, No.3, 1961, pp.366-392. 尽管如此,该文(第 389 页)并未否定其他地区(包括中东欧、阿拉伯和美洲等地区)成功开展“一体化”的可能,只是它们的道路与欧洲模式有所不同,并且哈斯也不认为存在什么普遍适用的“一体化法则”(Law of Integration)。该文后来被卡赞斯坦誉为“一篇关于比较地区主义的最重要的文章”,参见[美]彼得·卡赞斯坦:《地区构成的世界:美国帝权中的亚洲和欧洲》,秦亚青、魏玲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86 页。

<sup>④</sup> Ernst B. Haas and Philippe C. Schmitter, “Economics and Differential Patterns of Political Integration: Projections About Unity in Latin Americ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18, No.4, 1964, pp.705-737.

的困难和失败,不像在欧洲那样还做出过某些成功的积极预测。”<sup>①</sup>施密特也认为,“[在拉美]导致政治一体化的两个主要因素缺失,即‘外溢’和‘强化’。”<sup>②</sup>

约瑟夫·奈也进行过类似的理论尝试。他考察了东非和中美洲的地区一体化实践,发现新功能主义在解释东非和中美洲一体化进程时,存在许多不足。其中包括:在对东非共同事务组织(EACSO)进行研究时,奈认为,哈斯与施密特有关“自动政治化”(automatic politicization)的功能主义概念具有过于浓厚的对“事务管理”的偏好,而忽略了自觉政治行为,这不符合非洲的实际;<sup>③</sup>在审视中美洲共同市场(MCCA)取得成功的原因时,奈认为,其成功主要归功于中美洲政治联合的理想、中美洲政治文化中的某种特质、早期一体化过程中较低的成本以及有利的外部因素,但这四种因素中,除成本因素外其余都并非“外溢”的结果,因此并不涵盖在新功能主义的解释框架之内。<sup>④</sup>

总之,旧地区主义时期,运用欧洲一体化理论来诠释欧洲以外世界其他地区的实践基本上是失败的,没有产生有解释力的学术成果。而且,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由于受到来自现实主义特别是政府间主义的理论挑战,基于欧洲的“地区一体化的古典理论”日益变得缺乏解释力和说服力。哈斯本人甚至认为,地区一体化理论正逐渐变得“过时”(obsolescent),因为这些理论基于的三个核心假设,与积极参与地区组织的各国政府实际表现出的行为模式越来越不相符;1968年以来欧洲共同体的历史表明,大多数政府不再按照这些假设行事,尽管过去确是如此。<sup>⑤</sup>当然,随着“欧洲一体化研究”新领域在20世纪70年代风靡欧洲学界,不少学者开始借用比较政治学的分析工具,将欧共体视为一个“独一无二”的新政治实体来开展比较研究,继而加剧了人们对

<sup>①</sup> Ernst B. Haas and Edward Thomas Rowe, “Regional Organizations in the United Nations: Is There Externaliz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17, No.1, 1973, pp.3-54; 转引自[德]塔尼亚·A.博泽尔、[德]托马斯·里塞主编:《牛津比较地区主义手册》,第109-110页。

<sup>②</sup> Philippe C. Schmitter, “Three Neo-Functional Hypotheses about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23, No.1, 1969, pp.161-166; 转引自[德]塔尼亚·A.博泽尔、[德]托马斯·里塞主编:《牛津比较地区主义手册》,第150页。

<sup>③</sup> Joseph S. Nye, “Patterns and Catalysts in Regional Integr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19, No.4, 1965, p.881. 在文章中,约瑟夫·奈对中美洲共同市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考察其取得成功的原因。他认为,主要因素有中美洲政治联合的理想、中美洲政治文化中的某种特质、早期一体化过程中较低的成本和有利的外部因素这四个。笔者认为,除成本外,理想、文化与外部因素并非完全由于功能外溢造成。

<sup>④</sup> Joseph S. Nye, “Central American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Joseph S. Nye, ed., *International Regionalism: Readings*,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68, p.383; 转引自刘颖:《相互依赖、软权力与美国霸权:小约瑟夫·奈的世界政治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7页。

<sup>⑤</sup> 哈斯在这里所说的三个核心假设分别是:(1)一体化进程的结果必须有一个明确可界定的制度模式;(2)在与区域伙伴的关系和与非成员国的关系之间进行权衡取舍时,涉及的利益冲突应朝着有利于区域伙伴的方向解决;(3)决策应基于渐进主义(不连贯的渐进决策方式)。参见Ernst B. Haas, *The Obsolescence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or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75; Ernst B. Haas, “Turbulent Fields and the Theory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30, No.2, 1976, pp.173-212。

于欧洲地区一体化与世界其他地区一体化实践的认识鸿沟。尽管这暴露出欧洲知识体系在解释全球南方地区实践时的认识论局限,但也为全球南方突破理论依附性研究开辟了新的学术空间。

## (二) 基于全球南方本土特征的初步探索

这一时期,全球南方的学者专注于以本地区作为研究对象,致力于减少对西方世界的知识依赖,努力探索本地区的合作与一体化发展道路,并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视角和理论。尤其以拉美经济委员会所发展的结构主义学派为代表,有力推动了拉丁美洲第一波地区一体化研究浪潮。<sup>①</sup>拉美结构主义学派的创始人和奠基者是阿根廷经济学家普雷维什(Raúl Prebisch),他提出的“中心—外围”思想为拉美结构主义理论奠定了基石。<sup>②</sup>其主要观点是,通过加强地区合作建立一个地区范围的更大市场,是解决拉美国欠发达问题的关键。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普雷维什在多个场合阐述了关于拉美联合并建立“拉美共同市场”的主张。<sup>③</sup>在我们看来,拉美结构主义是从拉美地区发展中国家视角出发,并以发展中国家为实践基础创立和完善的南方地区主义理论。正如拉美学者比安库里(Andrea C. Bianculli)认为,拉美结构主义(连同拉美的“依附论”一起)是“第一次用真正本地的——和南方的——方法来调查该地区国际扩张的后果,及其对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sup>④</sup>尽管拉美结构主义的思想后来受到不少批评,但其影响却超出拉美,成为世界性的地区发展理论。

早期的全球南方学者还致力于研究本地区的泛地区联合思想及其来源。比如在拉美,“泛美主义”概念的最基本内容是“美洲联合”,也因此有许多学者将拉美独立英雄玻利瓦尔视为“泛美主义”的首倡者,但是,美国所提出的泛美洲体系与玻利瓦尔提出的泛美洲体系存在根本差别。<sup>⑤</sup>于是,为了将倡导拉美联合的“拉美主义”同此类“泛美主义”区别开来,拉美政界人士和学者将反映拉美大陆共同利益的“拉美主义”称为“大陆性民族主义”(Nacionalismo Continental)或“拉美民族主义”(Nacionalismo Latinoamericano),并认为大陆一体化是对玻利瓦尔大陆主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sup>⑥</sup>而

① [德]塔尼亚·A.博泽尔、[德]托马斯·里塞主编:《牛津比较地区主义手册》,第150页。

② 拉美结构主义也常被称作“拉美经委会主义”“普雷维什主义”“发展主义”等,是二战后兴起的一种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思想。

③ 董国辉:《劳尔·普雷维什经济思想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8-150页。

④ [德]塔尼亚·A.博泽尔、[德]托马斯·里塞主编:《牛津比较地区主义手册》,第150页。

⑤ 金将将:《制造“后院”:美国与美洲体系的初步建构(1880—1890)》,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1-25页。

⑥ 肖枫:《论玻利瓦尔的拉美联合思想——纪念西蒙·玻利瓦尔诞生二百周年》,载《世界历史》,1983年第3期,第18页。

在阿根廷学者格龙多纳(Mariano Grondona)看来,拉美国家就此开启了拉美(地区)主义的新进程。<sup>①</sup>

在非洲,自美国黑人学者杜波依斯(W. E. B. Dubois)、利比里亚作家布莱登(Edward Wilmot Blyden)等提出“泛非主义”(Pan-Africanism)的主张后,追求非洲统一、解放和复兴的泛非主义思想得到广泛传播。而泛非主义回归非洲大陆以后,其思想理论在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得以丰富和发展,许多代表作品相继问世。例如,1973年,非洲本土学者阿加拉(Adekunle Ajala)的《泛非主义:发展、进步与前景》一书,<sup>②</sup>详细描述了泛非运动从20世纪初到1973年的演变过程,并指出1963年成立的非洲统一组织(OAU)为泛非主义提供了具体实践场所。该书被著名非洲裔历史学家托尼·马丁(Tony Martin)誉为了解泛非主义与非洲国家间关系的重要指南。<sup>③</sup>

在亚洲,有学者曾总结亚洲地区主义研究在当前阶段的特征,指出在探讨权力平衡、地区秩序以及地区组织等议题时,东盟研究者才会提及“地区主义”(Regionalism),并且很少使用地区主义视角来阐释冷战时期的亚洲事务。<sup>④</sup>实际上,在旧地区主义时期,全球南方学者关于亚洲地区主义的讨论并不丰富,且主要集中在东盟方面,但它们呈现了鲜明的时代烙印,反映了冷战地缘政治与第三世界发展问题在亚洲,尤其是东南亚地区的交织。在美苏对峙的全球格局下,相关研究普遍围绕地区合作的结构矛盾展开,学者们剖析了东南亚地区合作的结构限制,认为东南亚地区主义内部因各国在政治和经济结构上的差异而步履维艰,<sup>⑤</sup>外部则深陷安全困境<sup>⑥</sup>与依附性经济关系<sup>⑦</sup>之中。同时,学者们也承认东盟作为中小国家“抱团取暖”机制的战略价值,强调了东盟作为“中小国家团结的象征”及其“有限制度”的特点。<sup>⑧</sup>由此可见,全球南方学者并非从美苏博弈如何塑造东盟的战略定位这一西方中心主义视角来观察本地

<sup>①</sup> Mariano Grondona, "Opinion: South America Looks at Detente (Skeptically)," *Foreign Policy*, No.26, 1977, pp.184-203.

<sup>②</sup> Adekunle Ajala, *Pan-Africanism: Evolution, Progress and Prospects*, André Deutsch, 1973, pp.43-49.

<sup>③</sup> Tony Martin, "Adekunle Ajala, Pan-Africanism: Evolution, Progress and Prospect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80, No.3, 1975, pp.698-699.

<sup>④</sup> See Seng Tan, "Knowing and Doing Regionalism in Asia: Theoretical Diversity and Pragmatic Conduct in the ASEAN Regional Project," in Jürgen Rütland and Astrid Carrapatoso, eds., *Handbook on Global Governance and Regionalis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22, p.204.

<sup>⑤</sup> Basu Sharma, "Foreign Capital and Economic Growth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Debt VS. Equity,"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ol.21, No.1, 1986, pp.60-70.

<sup>⑥</sup> Mohammed Ayoob, "The Security Problematic of the Third World," *World Politics*, Vol.43, No.2, 1991, pp.257-283.

<sup>⑦</sup> Johan Saravanamuttu, "Imperialism, Dependent Development and ASEAN Regionalism,"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Vol.16, No.2, 1986, pp.204-222.

<sup>⑧</sup> Hans H. Indorf, "ASEAN in Extra-Regional Perspective,"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9, No.2, 1987, pp.86-105.

区,而是更加重视东南亚的自主性和本土特征。这一点为未来新地区主义时期“本土化”阐释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 (三)早期的“模型化”比较研究

旧地区主义时期,学术界(主要是西方学者)对于南方地区主义的发展在进行理论解释的同时,也开展了“模型化”的比较研究,为当下的比较地区主义研究积累了宝贵经验。早期的“模型化”比较研究体现在,学者们以欧洲地区经济一体化路径为蓝本,习惯于按照自上而下、以机制为中心、较为线性的一体化路径来构建他们的比较分析框架。其理论依据主要是1950年瓦伊纳(Jacob Viner)提出的“关税同盟论”<sup>①</sup>和1961年巴拉萨(Bela Balassa)提出的“经济一体化阶段论”。<sup>②</sup>特别是后者,将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分为“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联盟、完全经济一体化”五个阶段,这五个阶段依次递进,构成地区合作由易入难、由单一到复合的演进顺序。1964年,哈斯与施密特在上述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比较框架,用以衡量经济联盟在多大程度上会导致政治联盟的出现。为了预测一体化过程中“自动政治化”的可能性,他们开发并评估了3个维度下的9个指标:属于“背景条件”维度的单位规模、交流频率、多元主义和精英互补性;属于“一体化进入经济联盟阶段的条件”维度的政府潜在计划、新的地区机制的权力和功能;属于“机制”维度的决策风格、交易增长率、政府和私人行为体的适应能力。<sup>③</sup>在这一框架达成后,他们和戴尔(Sidney Samuel Dell)都试图运用这一框架去研究拉丁美洲的地区一体化进程。<sup>④</sup>1965年,埃兹奥尼(Amitai Etzioni)尝试扩大理论推导和测试的案例范围,通过分析当时4个一体化尝试案例——欧洲经济共同体、北欧理事会、西印度联邦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来测试理论的效用。<sup>⑤</sup>1968年,奈提出使用两个指标来更系统、更科学地比较不同地区的一体化进程:第一个指标是地区内贸易(出口)指标;第二个指标是“服务一体化”指标,即地区政策和机构的融资预算情况,用以反映地区一体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维度——地区层面公共资金的使用(或未使用)情况。<sup>⑥</sup>通过使用这些指标,他对东非共同市场

<sup>①</sup> Jacob Viner, *The Customs Union Issu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1950.

<sup>②</sup> Bela Balassa, *The Theory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Richard D. Irwin, 1961.

<sup>③</sup> Ernst B. Haas and Philippe C. Schmitter, “Economics and Differential Patterns of Political Integration: Projections About Unity in Latin America,” pp.705-737.

<sup>④</sup> Philippe C. Schmitter, “A Revised Theory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24, No.4, 1970, pp.836-868; Sidney Samuel Dell, *A Latin American Common Marke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sup>⑤</sup> Amitai Etzioni, *Political Unifica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Leaders and Forces*,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5.

<sup>⑥</sup> Quoted from Philippe De Lombaerde et al., “The Problem of Comparison in Comparative Regionalism,”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36, No.3, 2010, p.750.

(EACM)、阿拉伯国家联盟(LAS)、美洲国家组织(OAS)和非洲统一组织(OAU)进行了比较。<sup>①</sup>

在早期的地区主义比较研究中,学者们似乎被组织数量的局限所束缚,他们的目光并未投向组织间的横向比较,而是致力于构建一个预先设定的一体化进程模型。通过这一模型,这些学者进行比较分析,试图揭示不同地区在这个既定模型上究竟走了多远。由于这一比较框架是基于框架内的指标进行的,因此,其评价相对公允,这也使得研究者能够对欧洲以及全球南方地区进行“一视同仁”的评估,这对于理解地区一体化进程的“深度”以及成员国的承诺水平颇有价值。遗憾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欧洲共同体内部遭遇了所谓“欧洲硬化症”(Euroclerosis),导致其发展陷入僵局。与此同时,在全球南方地区,众多组织亦普遍停滞不前,致使这一时期的地区主义比较研究难有突破。

### 三 新地区主义研究时期

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欧洲一体化运动再度趋于活跃,地区主义研究进入了新地区主义时期。这一时期,全球南方地区主义研究开始呈现出多元化和复杂化的特点。总体而言,其特点可概括为:尽管欧洲一体化经典理论范式在解释全球南方地区主义现象时存在局限性,但“新地区主义方法”(New Regionalism Approach, NRA)和建构主义理论等仍为全球南方地区主义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全球南方不同地区的特殊性诠释揭示了地区主义的多样性和本土经验的重要性;比较研究虽然存在“欧盟中心主义”偏向和局限性,但开发出的比较指标与方法对后来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 (一) 欧洲一体化理论的有限适用

在这一时期,随着冷战走向终结,地区主义展现出新的发展趋势。欧共体正式演变为欧盟,其内部统一大市场迅速扩大,并开始向建设经济货币联盟的方向发展,欧洲地区一体化水平持续提升。与之相应,欧洲一体化理论研究也迈入一个新的阶段。新兴的自由政府间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等理论,不仅能够有效解释欧洲一体化现象,而且学者们也尝试将它们应用于对全球南方地区主义的研究。

---

<sup>①</sup> Joseph S. Nye, “Comparing Common Markets: A Revised Neo-Functionalist Mode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24, No.4, 1970, pp.796-835; Joseph S. Nye, *Peace in Parts: Integration and Conflict in Regional Organizati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1; See also Philippe De Lombaerde et al., “The Problem of Comparison in Comparative Regionalism,” p.733.

政府间主义理论强调国家政府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重要性。作为传统政府间主义的代表人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从成员国的视角诠释一体化,认为成员国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主导方。在传统政府间主义的基础上,莫劳夫奇克(Andrew Moravcsik)提出的自由政府间主义理论认为,一体化是国家领导人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而进行的一系列理性选择的最终结果。<sup>①</sup>许多学者尝试运用这一理论来阐释全球南方地区主义,却频繁遭遇现实的挑战:在亚洲,将(自由)政府间主义应用到东亚地区主义的研究中,主要分析一个地区内权力分配以何种方式塑造政府间谈判的结果,但至今,权力在亚洲地区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还没有发挥特别大的作用。<sup>②</sup>非洲的地区主义现象同样与自由政府间主义的预设相悖,自由政府间主义认为地区化有助于催生正式制度建设意义上的地区主义,但有着比较强劲地区主义的南部非洲,却没有太强劲的经济地区化;<sup>③</sup>在拉美地区,自由政府间主义学者观察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简称“南共市”),发现这个以“政府间主义”为核心的关税同盟一体化模式,由于其区内贸易更多被“欧盟—南共市”合作替代,缺乏明显的区内经济相互依赖表征,其实践与自由政府间主义理论并不吻合,甚至有学者因此发出感叹:名为自由政府间主义的理论却无法解释南方共同市场的纯粹政府间主义现象。<sup>④</sup>

20世纪80年代以后,欧洲一体化制度的确立使现存政策保持了连续性,为了更好地理解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及其持久性,新自由制度主义开始成为欧洲一体化理论中的主流,<sup>⑤</sup>主要被用于分析国家间相互依赖水平及其与地区制度创建之间的关联。该理论同期被引入拉美地区,由于相互依赖和跨国化趋势的增强,人们普遍认为对拉美地区的利益有利,<sup>⑥</sup>故而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受到拉美地区主义研究者的青睐。据拉美学者蒂克纳(Arlene B. Tickner)统计,1988年至1998年间,在约95篇国际关系论文中,有15.8%运用了非国家中心视角,特别是相互依赖论。<sup>⑦</sup>在亚洲,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口碑”却不如在拉美地区,尽管瓦南迪(Jusuf Wanddi)认为,东盟国家在亚太安全

① [美]安德鲁·莫劳夫奇克:《欧洲的抉择——社会目标和政府权力:从墨西哥到马斯特里赫特》(上卷), 赵晨、陈志瑞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

② Mark Beeson and Richard Stubbs, eds., *Routledge Handbook of Asian Regionalism*, Routledge, 2012, p.6.

③ [德]塔尼娅·A.博泽尔、[德]托马斯·里塞主编:《牛津比较地区主义手册》,第9页。

④ Mahrukh Doctor, “Regionalism in the Global South: Understanding the Evolution of Mercosur,” in B. J. C. McKeercher, ed.,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Diplomacy and Statecraft* (Second Edition), Routledge, 2022, pp.309-320.

⑤ 范洪颖:《东亚大趋势——经济区域主义》,博士学位论文,辽宁大学,2006年,第35页。

⑥ 张建新:《从依附到自主:拉美国际关系理论的成长》,载《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第117页。

⑦ Arlene B. Tickner, “Hearing Latin American Voic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Vol.4, No.4, 2003, pp.325-350; 转引自张建新:《从依附到自主:拉美国际关系理论的成长》,第117页。

领域的行动,是亚洲中小国家在该地区对自由制度主义的尝试。<sup>①</sup> 还有学者指出,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亚太地区多边主义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对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提供了支持。但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暴露了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缺陷,因为该理论无法解释“在何时以及何种情况下制度能够改变国家行为,使国家从追求相对获益转向追求绝对获益”。<sup>②</sup> 阿查亚还指出,由于东亚国家之间还缺乏足够的相互依赖,使新自由制度主义在分析亚洲地区机制的本质存在不足。<sup>③</sup>

而随着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逐渐成为主流范式之一,一些学者开始使用该理论范式来考察地区主义。建构主义者把观念、规范、认同和话语置于核心位置,作为地区主义观念的动力,例如承认地区主义受到理念的和主体间的要素驱动,而不是受纯粹理性主义的要素驱动,并且可以根据规范性而非纯粹物质性判断结果。就此而言,建构主义推动了非西方世界地区主义研究新方式的发展。受此鼓舞,在东南亚、拉美、阿拉伯和非洲地区,文化和认同成为地区主义的驱动力量。<sup>④</sup> 不止于西方学者,建构主义也成为全球南方学者研究本地区的常用理论范式。不少全球南方本土学者通过剖析亚非拉地区中的“地区”“地区构建”(Regional-building)与“地区性”(Regionness)等概念,突出了观念、认同、话语等非物质性因素与全球南方地区主义的联系,注重分析全球南方地区主义现象背后的集体认同与社会化建构。观念和规范在解释世界各地不同形式的地区主义中发挥了特殊作用,其中,东南亚地区主义学者对其“独特性”的坚持最为明显。<sup>⑤</sup> 在拉美,梅拉(Laura Gomez Mera)观察到南共市共同身份的出现,指出南共市通过提供“一个稳定规范和程序框架,并建立规范化的互动模式,促进了各国之间更多的联系与社会化”。<sup>⑥</sup> 而地区主义研究中的“建构主义转向”为基于全球南

① Jusuf Wanandi, “Towards an Asian Security-Community,” *Asia Europe Journal*, Vol.3, No.3, 2005, pp.323-332.

② Kai He,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in the Asia Pacific: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China's Rise*, Routledge, 2009, p.6; 转引自左超:《制度现实主义与制衡——评〈亚太地区的制度制衡〉》,载《国际政治科学》,2010年第4期,第114页。

③ Amitav Achary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sia,” in David Shambaugh and Michael Yahuda,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Asia*,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8, pp.57-82.

④ 运用建构主义考察全球南方地区主义的文献有许多,代表作参见 Christopher Hemmer and Peter J. Katzenstein, “Why Is There No NATO in Asia? Collective Identity, Regionalism, and the Origins of Multilater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6, No.3, 2002, pp.575-607; Michael N. Barnett, “Sovereignty, Nationalism, and Regional Order in the Arab States Syste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9, No.3, 1995, pp.479-510.

⑤ Alice D. Ba, *(Re) Negotiating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Region, Regionalism, and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Hiro Katsumata, “ASEAN and Human Rights: Resisting Western Pressure or Emulating the West?” *The Pacific Review*, Vol.22, No.5, 2009, pp.619-637.

⑥ Laura Gomez Mera, “Explaining Mercosur's Survival: Strategic Sources of Argentine-Brazilian Convergence,”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Vol.37, No.1, 2005, p.135.

方地区的理论构建开辟了道路,特别是阿查亚对“本地化”问题的探讨,昭示了在地区内部进行理论化的重要性。<sup>①</sup> 在非洲,众多研究聚焦于“保护的责任”等国际规范是如何在非洲背景下实现本地化的,以及这些规范如何开始影响非洲地区组织的议程和政策。<sup>②</sup>

## (二) 立足于全球南方地区的特色解释

为拓展全球化背景下新地区主义研究的视野,赫特内(Björn Hettne)和索德鲍姆提出了“新地区主义方法”,该方法深受社会建构主义的一个新分支——能动性建构主义(Agential Constructivism)的启发,<sup>③</sup>试图综合分析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理念、行动和象征性动机,同时考量这些行为体所考虑的物质利益及其受到的结构约束。尽管很难说这种方法就是一种“理论”,但它的确是一种对地区主义具有特定理解的折中方法或分析路径。因此,“新地区主义方法”主要用于研究非国家行为体对由国家主导的地区主义的影响,以及国家行为体介入由非国家行为体驱动的行为,主要强调非国家和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强调地区化进程而非制度本身的作用。<sup>④</sup> 这一学派的实证研究范围很广,不仅包括非盟以及若干个次地区经济共同体,还包括不同层面的不同地区化进程,这些进程表现为各种跨国网络、跨境微型地区。<sup>⑤</sup> 有学者指出,这一方法尤其适用于研究全球南方的地区主义,因为全球南方具有许多这样的以各种非正式和

<sup>①</sup> Amitav Acharya, “How Ideas Spread: Whose Norms Matter? Norm Loca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Asian Reg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8, No.2, 2004, pp.239-275.

<sup>②</sup> Dapo Akande, Max Du Plessis and Charles C. Jalloh, *Position Paper: An African Expert Study on the African Union Concerns about Article 16 of the Rome Statute of the ICC*,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2010, pp.17-33; Jakkie Gilliers, Sabelo Gumede and Thembanani Mbadlanyana, “Africa and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What Role for the ICC?” *Irish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20, 2009, pp.55-67; Foluke Ipinoyomi, “Is Côte d’Ivoire A Test Case for R2P? Democratization as Fulfil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s Responsibility to Prevent,” *Journal of African Law*, Vol.56, No.2, 2012, pp.151-174.

<sup>③</sup> 有关“能动性建构主义”的文章,参见 J. Andrew Grant, “Agential Constructivism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20, No.2, 2018, pp.255-263; J. Andrew Grant, “Towards Praxes of the Region: Agential Constructivist Approaches to Regionalisms,” *International Journal: Canada’s Journal of Global Policy Analysis*, Vol.77, No.3, 2022, pp.414-429; J. Andrew Grant, Abdiasis Issa and Badriyya Yusuf, “Agential Constructivism, Shadow Regionalisms and Interregional Dynamics in the Horn of Africa,” in Elisa Lopez-Lucia and Frank Mattheis, eds.,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Interregionalism: Effects on Regional Actors, Societies and Structures*, Routledge, 2021, pp.165-184.

<sup>④</sup> 代表性文献参见 Björn Hettne, Andrés Inotai and Osvaldo Sunkel, eds., *Globalism and the New Regionalism*, Volume 1, St. Martin’s Press, 1999; Björn Hettne and Fredrik Söderbaum, “Theorising the Rise of Regionness,” in Shaun Breslin et al., eds., *New Regionalisms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Theories and Cases*, Routledge, 2002, pp.33-47; Fredrik Söderbaum and Timothy M. Shaw, eds., *Theories of New Regionalism: A Palgrave Reader*,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sup>⑤</sup> Fredrik Söderbaum and Ian Taylor, eds., *Afro-Regions: The Dynamics of Cross-Border Micro-Regionalism in Africa*, The Nordic Africa Institute, 2008; Daniel C. Bach, “Cross-Border Interactions and Regionalism,” in Daniel H. Levine and Dawn Nagar, eds., *Region-Building in Africa: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hallenges*,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pp.71-88.

非制度化的互动和活动为特征的地区。<sup>①</sup>

而得益于索德鲍姆等学者立足于非洲本地的深入研究,“新地区主义方法”在非洲地区主义研究中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索德鲍姆在深入分析非洲地区结构与国内政治结构的相互作用后,提出了“加强主权型地区主义”(Regime-boosting Regionalism)与“影子地区主义”(Shadow Regionalism)等概念,用以概括非洲地区主义的实质特征。<sup>②</sup>他观察到,众多非洲国家的政府往往只是利用地区主义来巩固其政权地位,提升现任政府的国际形象和合法性。在巴赫(Daniel Bach)看来,在非洲,从企业家到民间社会组织再到武装团体,非国家行为体可以“自下而上地”影响以国家为中心的地区主义;他还进一步发现非洲国家边境无论合法与否的非正式跨境贸易均存在“跨国地区化”现象。<sup>③</sup>这些无疑进一步丰富了对非洲地区主义的解释。

在亚洲,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日本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领头雁”,于是有关学者提出按“雁行模式”引导地区经济发展的设想,引发了学界的广泛讨论。<sup>④</sup>为推动东南亚次地区合作,1989年时任新加坡副总理吴作栋提出了“增长三角”(Growth Triangle)这一新型地区经济合作类型,于是,有不少学者围绕“新柔廖增长三角”“东盟北增长三角”“东盟东部增长三角”等进行实证研究。<sup>⑤</sup>而伴随着中国日益积极地参与地区合作实践,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地区主义的研究也进入“创生期”。<sup>⑥</sup>中国学者开始对亚洲地区主义的发展进行理论探索,并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1997年,朱锋发表了两篇相关主题论文,遵循国际学术界将地区主义同时与经济和安全联系起来讨

① J. Andrew Grant et al., “Regionalism Beyond State-Centrism: African Reg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Journal: Canada's Journal of Global Policy Analysis*, Vol.77, No.3, 2022, p.453.

② Fredrik Söderbaum, “Modes of Regional Governance in Africa: Neoliberalism, Sovereignty Boosting, and Shadow Networks,” *Global Governance*, Vol.10, No.4, 2004, pp.419-436; Fredrik Söderbaum, “Rethinking Regions and Regionalism,” *Georgetow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14, No.2, 2013, pp.9-18.

③ Daniel C. Bach, *Regionalism in Africa: Genealogies, Institutions and Trans-State Networks*, Routledge, 2016.

④ 讨论“雁行模式”与亚洲(东亚)地区主义关系的文献十分丰富,参见 Mitchell Bernard and John Ravenhill, “Beyond Product Cycles and Flying Geese: Regionalization, Hierarchy, and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East Asia,” *World Politics*, Vol.47, No.2, 1995, pp.171-209; Silvio Yoshio Mizuguchi Miyazaki, “Regionalism in Asian Pacific: Economic Integration Oriented to Foreign Trade,” *Brazil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16, No.1, 1996, pp.137-151; Kiyoshi Kojima, “The ‘Flying Geese’ Model of A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Origin, Theoretical Extensions, and Regional Policy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Vol.11, No.4, 2000, pp.375-401.

⑤ 有关“增长三角”的代表性文献,参见 Heinz W. Arndt, “Anatomy of Regionalism,”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Vol.4, No.2, 1993, pp.271-282; Matthew Sparke et al., “Triangulating the Borderless World: Geographies of Power in the Indonesia-Malaysia-Singapore Growth Triangle,”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Vol.29, No.4, 2004, pp.485-498; Dewi Fortuna Anwar, “Regionalism Versus Globalism: A Southeast Asian Perspective,” *The Korean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 Vol.8, No.2, 1996, pp.29-52。著名的地区主义学者索德鲍姆还认为,这种“增长三角”模式是东南亚最重要的微观地区主义形式之一。参见 Fredrik Söderbaum, “Exploring the Links between Micro-Regionalism and Macro-Regionalism,” in Mary Farrell, Björn Hettne and Luk Van Langenhove, eds., *Global Politics of Regionalism: Theory and Practice*, Pluto Press, 2005, pp.87-103。

⑥ 耿协峰:《中国地区主义研究30年》,载《国际政治科学》,2022年第4期,第60-61页。

论的学术路径,认真评析了地区主义(区域主义)的一般概念和基本理论,并对“东亚区域主义”展开了学理分析,开风气之先,成为中国地区主义研究学术创生的旗帜性文章。<sup>①</sup>同一年,王正毅在其专著中,将东南亚作为一个区域整体进行地缘政治经济研究,创造性地提出“边缘地带发展论”,为解释东南亚地区的发展模式包括东亚地区国际体系的变革,提供了一种非常有说服力的理论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东亚地区主义诠释的学理基础。<sup>②</sup>1999年,李琮和庞中英也分别发表重要论文,对当代经济地区化与地区主义新趋势进行了初步系统论证,并成为不久后以陈玉刚、肖欢容、耿协峰等为代表的一批青年学者开展“新地区主义研究”的先声。<sup>③</sup>这表明,亚洲本土学者开展的地区主义研究开始兴起,并在国际学术界逐步取得一定的话语权。

在拉丁美洲,本土学者似乎总会发明一些与地区主义相关联的新概念。例如,拉美经委会在总结20世纪90年代拉美一体化新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开放的地区主义”(Open Regionalism)战略思想,以指导拉美一体化继续朝着具有“开放性”的地区一体化方向发展。<sup>④</sup>该理念主张摒弃过去封闭式的一体化模式,通过地区一体化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拉美与世界的接轨,共享全球化的红利。再如,以马拉穆德(Andrés Malamud)为代表的学者们发现,拉美国家“左”倾总统们在某些地区倡议中扮演了核心角色,并提出了“总统间主义”(Inter-presidentialism)这一独特概念。<sup>⑤</sup>他们认为,拉美地区主义是通过政府间机制推进的,总统们扮演了关键角色。依靠总统进行谈判和执行地区战略,可以保持足够的灵活性来推进计划、避免可能出现的瘫痪和僵局,同时还能化解由特定事件引发的危机。<sup>⑥</sup>此外,还有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这种由美国带头通过经济地区主义在国际市场上发展比较优势的倡议,被称为“战略地区倡议”<sup>⑦</sup>。

① 朱锋:《关于区域主义与全球主义》,载《现代国际关系》,1997年第9期,第41-46页;朱锋:《东亚需要什么样的区域主义?——兼析区域主义的基本理论》,载《太平洋学报》,1997年第3期,第31-42页。

② 王正毅:《边缘地带发展论——世界体系与东南亚的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③ 李琮:《论经济地区化》,载《太平洋学报》,1999年第2期,第14-24页;庞中英:《地区主义与民族主义》,载《欧洲》,1999年第2期,第40-46页;陈玉刚:《国家与超国家——欧洲一体化理论比较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肖欢容:《地区主义:理论的历史演进》,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耿协峰:《新地区主义与亚太地区结构变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④ 王萍:《拉美“开放的地区主义”与中国》,载《拉丁美洲研究》,2002年第5期,第21页。

⑤ Andrés Malamud, “Presidential Diplomacy and the Institutional Underpinnings of Mercosur: 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Vol.40, No.1, 2005, pp.138-164.

⑥ Jorge I. Domínguez, e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Democracy: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98; Andrés Malamud, “Presidentialism and Mercosur: A Hidden Cause for a Successful Experience,” in Finn Laursen, ed., *Comparative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shgate Publishing, 2003, pp.53-73.

⑦ José Briceño Ruiz, “Strategic Regionalism and Regional Social Policy in the FTAA Process,” *Global Social Policy*, Vol.7, No.3, 2007, p.297.

### (三) 以欧盟为基准的“模板化”比较研究

随着冷战的结束,越来越多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开始在地区舞台上活跃起来,它们的活动跨越了安全、发展、贸易、环境、文化等多个相互交织的维度。欧洲以及全球南方地区的地区主义现象,不仅展现出多维度的特征,也呈现出多元性的面貌,促使地区主义理论和方法大量涌现。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比较分析逐渐成为地区主义研究领域中最关键的发展趋势之一。与哈斯以及早期地区一体化学者所处的时代相比,此时世界的地区主义现象更为复杂多变,无论是在本体论还是认识论层面,都经历了显著的转变。因此,比较研究的基础也随之发生根本性变化,早期那种简单的“模型化比较”方法已不再适应时代的需求。

在这一时期,欧洲一体化理论和实践的优势地位明显,由此也产生了将欧洲一体化经验作为全球南方地区的比较参照物的研究偏向。即便有学者经常认为自己所研究的地区“特殊”,甚至“独一无二”,但他们往往会或隐或显地与欧洲一体化进行比较,仍会先从研究欧洲地区一体化过程中得出的“背景条件”或“外溢”效应入手,对全球南方地区的一体化发展趋势进行一般性概括。这类研究专注于解释非欧洲地区与作为“黄金标准”的欧洲/欧盟案例的差异。布雷斯林(Shaun Breslin)等学者曾批评道,认为地区一体化的“发展”要对标欧盟式的制度化,体现了一种“目的论偏见”,在这一比较模式下,其他地区主义形式往往被描述为松散的、非正式的(如亚洲)或“薄弱的”(如非洲)。<sup>①</sup>也正如卡帕拉索(James A. Caporaso)指出的那样,“随着欧洲共同体的发展,其制度基础的厚度增加,政策权限范围的扩大,总体上变得更加复杂,它也被更狭隘地研究,与其他地区一体化进程的研究渐行渐远”。<sup>②</sup>默里(Philomena Murray)后来将这种比较模式称为“一体化的势利眼”(Integration Snobbery),认为它加强了欧盟与世界其他地区主义之间的两极分化。<sup>③</sup>最近,更有学者明确指出,从 20 世纪 70 年代就已开始出现的“欧洲一体化研究”大大加深了欧洲与其他地区研究之间的鸿沟,因为学术界许多学者开始认为,欧共体/欧盟是一个全新的政治实体,没有适当的地区一体化项目可与之进行比较。<sup>④</sup>

<sup>①</sup> Shaun Breslin, Richard Higgott and Ben Rosamond, “Region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Shaun Breslin et al., eds., *New Regionalisms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Routledge, 2002, p.2.

<sup>②</sup> James A. Caporaso et al., “Does the European Union Represent an n of 1?” *ECSA Review*, Vol.10, No.3, 1997, pp.1-5.

<sup>③</sup> Philomena Murray, “Comparative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the EU and East Asia: Moving Beyond Integration Snobbery,”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47, No.3-4, 2010, pp.308-323.

<sup>④</sup> Tobias Lenz and Fredrik Söderbaum, “Comparative Regionalism Beyond Europe Versus the Res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25, DOI:10.1017/S0260210525000038.

当然,并非所有的“欧盟 vs 全球南方”的比较都是如此,比较是为了鉴别出特色和差异,地区主义的“欧盟 vs 全球南方”比较也主要是为了认识全球南方各地区主义不同于欧洲的特点及其成因,并达到最终目的——借鉴欧洲经验,考察它是否适合本地区实践,“为我所用”。<sup>①</sup>例如,多鲁奇(Ettore Dorrucci)等人比较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欧盟达成货币一体化的条件与90年代南共市的形成条件,建议拉丁美洲在推进地区一体化时,应借鉴欧洲的经验,重视制度一体化的建设,以促进经济一体化的深化。<sup>②</sup>赞克(Wolfgang Zank)分析了非盟与欧盟在一体化程度上的差异,并总结了非洲一体化进展缓慢的原因在于,非洲各国缺少宪法共识和相互兼容的社会经济体制。<sup>③</sup>中国学者在进行欧亚比较时,分别用“结构性地区主义”和“开放性地区主义”来概括欧亚两地的不同特点,并得出“两种性质的地区主义并无优劣之分”的结论。<sup>④</sup>由此可见,在这一时期,比较研究的焦点往往集中在将一个地区的经验教训移植到另一个地区,从而呈现出四个显著特征:首先,分析的核心几乎总是围绕地区组织的“一体化水平”展开;其次,在地区合作的进程中,无论是隐含还是显性,政治一体化水平始终是追求的目标;再次,解释影响合作结果的独立变量时,研究者往往忽视地区外因素的作用;最后,研究中对全球南方各地区之间的比较明显不足,且缺乏欧洲以外的实证研究,许多比较往往是源于偶然发现或个别研究人员的偶然所得,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理论的普适性和深度。

不过,这一时期的“欧盟 vs 全球南方”比较也开发出许多比较指标与比较方法,惠及后来的全球南方地区主义比较。马特利(Walter Mattli)精心设计了一套经济分析的比较模型,用以追踪需求因素(经济激励、相对收益、市场收益等)与供给因素(地区领导力)之间的匹配程度。<sup>⑤</sup>马克·韦伯(Mark Webber)等总结了安全治理的五个核心特征——层次结构、行为体互动、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化、规范与正式规则、集体目标。<sup>⑥</sup>

<sup>①</sup> 耿协峰:《中国地区主义研究的十大争论及其进展》,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第174页。

<sup>②</sup> Ettore Dorrucci et al., “European Integration: What Lessons for Other Regions? The Case of Latin America,” *ECB Working Paper*, No.185, 2002; Ettore Dorrucci et al., “The Link Between Institutional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Insights for Latin America from the European Experience,” *Open Economies Review*, Vol.15, No.3, 2004, pp.239-260.

<sup>③</sup> Wolfgang Zank, *A Comparative European View on African Integration: Why It Has Been Much More Difficult in Africa than in Europe*, Center for Comparative Integration Studies Research Series, Working Paper, No.4, 2007, pp.1-28.

<sup>④</sup> 仇发华:《结构性地区主义与开放性地区主义——西欧与东亚的比较》,载《当代亚太》,2011年第2期,第53-67页。

<sup>⑤</sup> Walter Mattli, *The Logic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Europe and Beyo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sup>⑥</sup> Mark Webber et al., “The Governance of European Securit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30, No.1, 2004, pp.3-26.

在我们看来,这些特征要素同样可以作为比较指标。继韦伯之后,基尔希纳(Emil Kirchner)提出,协调、管理和监管是治理的三个关键组成部分,也是实证检验治理的三种重要工具,并为承载更为分散的比较指标提供了一个宏观的大框架。<sup>①</sup>在研究方法上,杰纳(Gaspere M. Genna)等通过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美洲、亚洲和欧洲的 4 个地区一体化案例(安第斯条约组织、东盟、中美洲共同市场和欧盟)进行了深入分析,探讨了地区一体化与制度同质性之间的因果关系。多鲁奇等学者在比较欧盟与拉美时,采用了 VAR 方法(向量自回归模型)来分析制度一体化与经济一体化之间的因果关系。<sup>②</sup>

总之,新地区主义研究时期,比较分析成为地区主义研究的关键趋势。尽管比较研究显著体现出以欧盟为基准的“模板化”特征,成为全球南方地区比较的默认参照系,显然,欧盟的独特性被过度强调,而全球南方的地区特质在对比过程中受到遮蔽;但值得肯定的是,这一时期的比较研究推动了比较指标和方法论的创新,为后续的多元化比较研究奠定了基础。

#### 四 比较地区主义研究时期

21 世纪头十年的中后期,特别是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西方欧洲一体化理论的参考价值逐渐减弱,学者们开始更多地关注全球南方地区主义研究,并根据本土情况出现了许多研究创新,包括本土学者对本地区特殊性的研究、对结构性因素的补充等。在地区主义的比较研究领域,针对全球南方地区组织的案例研究日益丰富。这些研究通过对比不同地区组织的发展路径、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与差异,以及在特定领域的表现,为构建具有普遍意义的比较地区主义研究领域贡献了新的视角。与此同时,欧盟在这些比较研究中的角色发生了转变,它不再被视为地区主义比较的“黄金标准”(或唯一基准),而是作为比较地区主义研究中的一个平等主体、一个比较维度,

<sup>①</sup> Emil J. Kirchner, “EU Security Governance in a Wider Europe,” in Paolo Foradori, Paolo Rosa and Riccardo Scartezzini, eds., *Managing a Multilevel Foreign Policy: The EU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Lexington Books, 2007, pp.23-41. 具体来说,该文所提出的“协调”关注的是行为体间的相互作用方式,以及在决策、实施和控制过程中谁将扮演领导角色;“管理”则涉及风险评估、监测、谈判、调解和资源分配等职责;“监管”则被视为政策结果的体现——预期目标、动机培育、有效影响以及所创造的制度环境。

<sup>②</sup> Ettore Dorrucci et al., “The Link Between Institutional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Insights for Latin America from the European Experience,” pp.239-260. 他们的模型包含了六个关键变量:实际汇率波动性(REV)、制度整合指数(INST)、贸易开放度(Tiopen)、实际利率变化的相关性(Rconv)、消费者价格指数变化的标准差(CPlconv)和人均实际 GDP 的标准差(GDPconv)。

或者只是作为比较过程中的中介。这一趋势表明,地区主义学术界正在朝着真正的全球比较研究迈进。

### (一) 欧洲一体化理论的参考价值逐渐减弱

随着治理研究的兴起,欧盟学界试图对欧盟这一多层治理政体的特性进行新的阐释,欧洲一体化研究由此出现“制度转向”,许多学者依循新制度主义的三大流派(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与社会学制度主义),去解释欧盟的制度运作逻辑。<sup>①</sup>虽然这些流派早在新地区主义研究时期就已进入了全球南方地区主义研究的视野,但直到2008年之后相关的研究才逐渐增多。<sup>②</sup>鉴于历史制度主义对于长时段历史分析具有独特优势,而全球南方地区主义又是通过一次次的合作浪潮获得发展,并且期间发生了多次变迁态势,因此,不少学者引入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模式,来审视地区某个领域合作的变迁或某一地区性机制的发展与演化,如东盟安全共同体变迁规律<sup>③</sup>、东盟地区环境治理制度的演进逻辑<sup>④</sup>、加勒比共同体(CARICOM)在加勒比地区体系构建中的作用<sup>⑤</sup>等,以把握全球南方地区主义中制度变迁的因果链条、动力机制及未来发展方向。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探讨理性行为体如何设计欧盟政治制度,并使其效用最大化,以及欧盟机构如何塑造和约束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决策。<sup>⑥</sup>在应用其考查全球南方地区主义时,学者们主要关注全球南方地区的制度设计和地区组织的调节作用。如在探讨非洲地区主义时,学者们对非盟与各地区经济共同体及其制度设计,能否有效协助成员国解决各类政策领域的集体行动问题给予高度关注。<sup>⑦</sup>社会学制度主义在欧

① Mark D. Aspinwall and Gerald Schneider, “Same Menu, Separate Tables: The Institutional Turn in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Study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38, No.1, 2000, pp.1-36.

② 在新地区主义研究时期,学界运用新制度主义三大流派来解释全球南方地区主义的可查文献相对较少,但也不乏代表作,如多鲁奇等人对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拉丁美洲的实践提出了批评意见,认为其存在过分强调选举和立法领域、过度依赖正式规则、政治变革的解释不完整、制度创建的分析不充分等缺陷,参见 Ettore Dorrucci et al., “The Link Between Institutional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Insights for Latin America from the European Experience,” pp.239-260; 又如马克·比森和伽腻色迦·贾亚苏里亚认为,重商主义(或以国内安全为中心)的理性推动了东亚一体化,参见 Mark Beeson and Kanishka Jayasuriya, “The Political Rationalities of Regionalism: APEC and the EU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e Pacific Review*, Vol.11, No.3, 1998, pp.311-336.

③ 江帆:《东盟安全共同体变迁规律研究——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与阿米塔·阿查亚教授商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④ 赵祺:《跨越环境主权:东盟地区环境治理制度的演进逻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载《东南亚研究》,2023年第1期,第23-41页。

⑤ Nand C. Bardouille, “Caribbean Regionalisms in a Comparative-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Making of Four Regional Systems,” *Canadian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Studies*, Vol.43, No.2, 2018, pp.171-211.

⑥ 贺之昊:《欧洲一体化研究:西方叙事与中国视角》,第119-145页。

⑦ Anthoni Van Nieuwerkerk,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Southern African Development Community: Insights from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Military Studies*, 2006, DOI: 10.5787/34-2-21; Amanda Bisong, “Trans-Regional Institutional Cooperation as Multilevel Governance: ECOWAS Migration Policy and the EU,”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Vol.45, No.8, 2019, pp.1294-1309.

洲一体化中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欧盟规范,并且认为欧盟的制度可以影响社会和文化结构,而社会和文化结构又能影响和塑造国内行为体的表现。<sup>①</sup>虽然将社会学制度主义与全球南方地区主义直接关联起来的研究并不多见,但受社会学制度主义影响提出的“制度同构”“制度扩散”“规范扩散”等概念,却是比较地区主义研究时期观察全球南方地区主义现象的重要视角。如耶茨奇克(Anja Jetschke)指出,东盟的“弱”制度发展特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试图模仿欧洲一体化的形式,而非其核心内容。<sup>②</sup>哈斯特普(Toni Hastrup)考察了在欧盟与非洲的地区间关系中,欧盟如何通过政策扩散来推广其地区一体化经验。<sup>③</sup>

尽管后功能主义这一理论是欧洲一体化理论的新发展,但它过于为欧盟“量身定制”,主要集中于研究在欧洲化冲击下,国内政治层面(国内政治化进程)如何回应欧洲一体化的发展与影响。<sup>④</sup>实际上,这一理论主要关注政党政治与民众偏好的特点,与全球南方地区主义目前所呈现的现实情况并不相符,参考价值甚微。因此,在学术界,几乎没有学者利用这一理论来分析全球南方地区主义。然而,在这一时期,仍有许多学者还在使用先期流行的新功能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等理论进行研究。他们大多是全球南方本土学者,如马拉穆德运用新自由制度主义和新功能主义来解释拉丁美洲安全形势;<sup>⑤</sup>易卜拉欣(Sheriff Ghali Ibrahim)通过政府间主义观察非盟的效率;<sup>⑥</sup>诺尔特(Detlef Nolte)等向我们展示了拉丁美洲地区主义是如何通过扩展而非深化,以及通过“封装”(encapsulation),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回溢”(spill-around)得以存续,他不仅阐明了拉丁美洲地区主义在逆境中的韧性,也阐明了新功能主义理论解释的韧性。<sup>⑦</sup>

① 房乐宪、方婧懿:《社会学制度主义对欧洲一体化的理解与启示》,载《教学与研究》,2024年第5期,第96-107页。

② 转引自江忆恩、赵若祯、刘若楠:《东亚对于国际关系理论深意何在?》,载《云大地区研究》,2020年第1期,第146-178页。

③ Toni Hastrup, "EU as Mentor? Promoting Regionalism as External Relations Practice in EU-Africa Relations," *Journa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Vol.35, No.7, 2013, pp.785-800.

④ 李明明:《后功能主义理论与欧洲一体化》,第33-45页。

⑤ Andrés Malamud and Luis L. Schenoni, "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and Neofunctionalism in Latin American Security Studies," in David R. Mares and Arie M. Kacowicz, eds., *Routledge Handbook of Latin American Security*, Routledge, 2016, pp.44-55.

⑥ Sheriff Ghali Ibrahim, David Ogbeydi and J. W. Adams, "An Intergovernmentalist Approach to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Africa; The Efficacy of the African Un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and Modern Education*, Vol.1, No.1, 2015, p.461.

⑦ Detlef Nolte and Brigitte Weiffen, "The Resilience of Latin American Regionalism: A Neofunctionalist Perspective," *Politische Vierteljahresschrift (German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2024, DOI: 10.1007/s11615-024-00571-w. 值得一提的是,施密特曾于1970年发表观点相似的文章,参见 Philippe C. Schmitter, "Central American Integration: Spill-over, Spill-around or Encapsulation?"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9, No.1, 1970, pp.1-48。

## (二) 全球南方地区主义研究不断创新

全球南方地区主义本土研究主要围绕阐释本地区特殊性与补充结构性因素两方面来开展。

一方面,全球南方本土学者基于本地区特殊性广泛开展了研究。进入 21 世纪后,欧盟遭遇债务危机、移民危机和“英国脱欧”等一系列危机,从而引发了对其作为地区一体化“成功典范”的质疑。在实证研究方面,与欧盟地区一体化路径的研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全球南方地区主义的研究表明,超国家一体化并非全球普遍采用的最理想模式。还有研究表明,尽管某些地区主义旨在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但经济相互依赖并非全球地区主义的普遍特征。<sup>①</sup>且比起纯粹解决功能问题,全球南方地区主义更加强调规范与认同的重要性。<sup>②</sup>

具体地看,在非洲大陆,受到泛非主义思想的激励,一群致力于地区规范性研究的学者,通过深入探讨非洲地区组织的制度演进与规范创新,组成了“非洲一体化学派”(African Integration School)。这一学派坚持“非洲问题非洲人解决”的核心原则,主要由南非开普敦大学教授约翰·阿科帕里(John Akokpari)、开普敦冲突解决中心(CCR)高级研究员安吉拉·恩丁加-穆文巴(Angela Ndinga-Muvumba)以及开普敦大学教授蒂姆·穆里蒂(Tim Murithi)等非洲本土或非洲裔学者构成。该学派倾向于从外部视角审视非洲大陆,认为在新殖民主义影响下的不平等的全球格局中,非统/非盟以及若干个次地区经济共同体(RECs)构成适合非洲大陆的治理架构。<sup>③</sup>他们主张通过减少对外依赖和增强集体自主性,来推动非洲在经济、政治以及社会文化领域的发展。<sup>④</sup>此外,该学派还强调,尽管全球化带来了挑战,非洲仍应积极参与全球经济和全球治理,以降低被边缘化的风险。<sup>⑤</sup>

在亚洲,随着亚洲崛起为世界经济的新引擎,东盟及其后冷战时期新成立的机制,如东盟地区论坛(ARF)、“东盟+3”机制等,以及亚洲各种地区次地区合作活动均日益活跃,其发展体现了“地区化水平高而地区主义水平低”<sup>⑥</sup>的特点,这与其他地区明显

<sup>①</sup> Haroldo Ramanzini Júnior and Bruno Theodoro Luciano, “Regionalism in the Global South: MERCOSUR and ECOWAS in Trade and Democracy Protection,”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41, No.9, 2020, pp.1498-1517.

<sup>②</sup> Pia Riggiozzi, “Region, Regionness and Regionalism in Latin America: Towards a New Synthesis,” *New Political Economy*, Vol.17, No.4, 2012, pp.421-443.

<sup>③</sup> John Akokpari, Angela Ndinga-Muvumba and Tim Murithi, eds., *The African Union and Its Institutions*, Jacana Media, 2008; Tim Murithi, “The African Union and the Institutionalisation of Pan-Africanism,” in Reiland Rabaka, ed., *Routledge Handbook of Pan-Africanism*, Routledge, 2020, pp.373-384.

<sup>④</sup> Ernest T. Aniche, “From Pan-Africanism to African Regionalism: A Chronicle,” *African Studies*, Vol.79, No.1, 2020, pp.70-87.

<sup>⑤</sup> Léonce Ndikumana, “Integrated Yet Marginalized: Implications of Globalization for African Development,” *African Studies Review*, Vol.58, No.2, 2015, pp.7-28.

<sup>⑥</sup> [德]塔尼娅·A.博泽尔、[德]托马斯·里塞主编:《牛津比较地区主义手册》,第216页。

有所不同。也有学者指出,亚洲地区主义的发展并不完全符合“西方中心主义”的地区主义元叙事框架。<sup>①</sup>由此,亚洲本土学者对于亚洲的地区安全<sup>②</sup>、“地区性”<sup>③</sup>、地区制度建设<sup>④</sup>以及地区共同体<sup>⑤</sup>等的研究更加聚焦于亚洲地区的独特性,力图揭示出亚洲地区主义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动力。而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在这一时期结合中国参与亚洲地区合作的实践经验,也不断推出新成果,其中代表性成果有:魏玲的“关系平衡论”<sup>⑥</sup>、周方银的“东亚二元格局论”<sup>⑦</sup>、任晓的“东亚共生体系论”<sup>⑧</sup>、郑先武的“区域间主义治理模式论”<sup>⑨</sup>、张云的“区域建构论”<sup>⑩</sup>、顾炜的“双重结构论”<sup>⑪</sup>、王志的“多重一体化论”<sup>⑫</sup>等。

在拉丁美洲,各国正积极寻求除美国以外的贸易伙伴和外部市场,同时,由于内部次地区一体化集团的持续分化、重组与革新,这一地区主义建设的新趋势也被当地学者赋予重要的意义:南美国家联盟被萨纳胡贾(José Antonio Sanahuja)称之为“后自由地区主义倡议”(Post-liberal Regionalism Initiatives),因为它能够应对“华盛顿共识”框架下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信誉和合法性日益丧失所带来的地区和全球变革,<sup>⑬</sup>而里格罗兹(Pia Ruggirozzi)等将拉丁美洲的地区倡议称为“后霸权地区主义”(Post-hegemonic regionalism),描述其为“部分取代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治理形式的结果”。<sup>⑭</sup>

另一方面,全球南方地区主义研究者认为,尽管上述欧洲一体化的主流理论和方法,如政府间主义、制度主义、建构主义以及“新地区主义方法”等,为解释全球南方地

① See Seng Tan, “Knowing and Doing Regionalism in Asia: Theoretical Diversity and Pragmatic Conduct in the ASEAN Regional Project,” p.203.

② Evelyn Goh and Amitav Acharya,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and Security Regionalism: Comparing Chinese and American Positions,” in Melissa G. Curley and Nicholas Thomas, eds., *Advancing East Asian Regionalism*, Routledge, 2007, pp.96–115.

③ Takeko Inuma, “ASEAN and Its Regional Integ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ness’,” Dissertation of Senshu University, 2014.

④ Giovanni Capannelli and See Seng Tan, “Institutions for Asian Integration; Innovation and Reform,” in Giovanni Capannelli and Masahiro Kawai,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sian Regionalism*, Springer Japan, 2014, pp.143–167.

⑤ Ferhat Durmaz, “ASEAN Regionalism in the 21st Century: A Review of the Community-Building Process (2003–2015),” *MANAS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 Vol.12, No.2, 2023, pp.759–774.

⑥ 魏玲:《关系平衡、东盟中心与地区秩序演进》,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7期,第38–64页。

⑦ 周方银:《中国崛起、东亚格局变迁与东亚秩序的发展方向》,载《当代亚太》,2012年第5期,第4–32页。

⑧ 任晓:《论东亚“共生体系”原理——对外关系思想和制度研究之一》,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7期,第4–22页。

⑨ 郑先武:《区域间主义治理模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⑩ 张云:《国际关系中的区域治理:理论建构与比较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7期,第186–203页。

⑪ 顾炜:《双重结构与俄罗斯的地区一体化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

⑫ 王志:《区域一体化的多重路径——地区经济组织的定性比较分析》,载《国际论坛》,2021年第2期,第120–141页。

⑬ José Antonio Sanahuja, *Post-liberal Regionalism in South America: The Case of UNASUR*, EUI Working Paper RSCAS 2012/05.

⑭ Pia Ruggirozzi and Diana Tussie, eds., *The Rise of Post-hegemonic Regionalism: The Case of Latin America*, Springer Dordrecht, 2012, p.12.

区主义的创建及其形式和特点提供了重要见解,但是,它们对全球南方地区主义的阐释绝非全面和周延,还需要用结构性因素来加以补充。为此,许多学者(不只是全球南方本土学者)从结构性因素出发进行研究,特别关注地区外因素和地区强国的影响,试图完善现有的理论解释。对于地区外因素的考察,有学者指出,全球南方地区主义似乎比欧洲地区一体化更多地受到体系性因素和地区外发展的影响。<sup>①</sup> 在他们看来,全球南方地区主义是对全球化趋势的回应,这些地区组织的成员由于担心在全球出口和投资市场中失去份额,所以就以地区为合作载体,既为了整合地区市场,又意在向全球开放,将其信号传递给国际投资者。<sup>②</sup> 而这种地区外的一体化动因在欧洲并不那么显著,因为欧盟具有高度相互依赖的地区市场,并从中获得比较成本优势和规模经济。<sup>③</sup> 因此,有学者指出,在欧洲一体化理论中,体系性因素与地区外因素几乎未被概念化。<sup>④</sup> 不过,这些因素在全球南方地区主义研究中得以显现。研究者注意到,相较于欧盟,东盟、南共市以及南共体的内部贸易水平都较低,但一旦获得国际投资者及地区外贸易伙伴的认可,地区外投资的流入将促进地区内贸易的增长。<sup>⑤</sup> 与此同时,不少学者发现,全球南方地区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区强国的影响,但至于影响是正面或负面,仍存在分歧。一方面,有观点认为地区强国的存在对地区一体化具有正面作用。比如汉考克(Kathleen Hancock)认为,地区强国是推动南部非洲关税同盟与欧亚地区安排形成的动因之一,<sup>⑥</sup>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富国委托理论”(theory of plutocratic delegation),以南部非洲关税同盟为例对该理论进行了阐释。<sup>⑦</sup> 另一方面,有学者提出地区大国并不一定会利用其力量来促进地区一体化。比如,克拉波尔(Sebastian Krapohl)通过援引巴西在南共市以及南非在南共体的实例,指出这些地区大国由于已经控制了最大且最有吸引力的地区经济,而从地区一体化中所获利益可能小于与其他地区国家的互动收益,因此,这些主导国家可能不会提供必需的地区领导力,反而

① Edward Mansfield and Eric Reinhardt, "Multilateral Determinants of Regionalism: The Effects of GATT/WTO on the Formation of Preferential Trading Arrangement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7, No.4, 2003, pp.829-862.

② Sebastian Krapohl, "Regionalism: In Crisis?" in Timothy M. Shaw et al., eds.,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p.93.

③ Edward Mansfield and Eric Reinhardt, "Multilateral Determinants of Regionalism: The Effects of GATT/WTO on the Formation of Preferential Trading Arrangements," pp.829-862; quoted from Sebastian Krapohl, "Regionalism: In Crisis?" p.92.

④ Sebastian Krapohl, "Regionalism: In Crisis?" p.93.

⑤ Simon Fink and Daniel Rempe, "Trade Network Analyses," in Sebastian Krapohl, ed.,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the Global South: External Influence on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ASEAN, MERCOSUR and SADC*,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pp.91-112; Lorraine Eden, "Multinational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he New Regionalism in the Americas," *Integration and Trade*, Vol.11, No.26, 2007, pp.97-123.

⑥ Kathleen J. Hancock, *Regional Integration: Choosing Plutocracy*, Palgrave Macmillan US, 2009; quoted from Jürgen Rüländ and Astrid Carrapatoso, eds., *Handbook on Global Governance and Regionalism*, p.40.

⑦ Kathleen J. Hancock, *Regional Integration: Choosing Plutocracy*, pp.35-60. 在该理论框架下,成员国将政策制定权委托给地区一体化进程中经济实力最强的成员国,本例特指南非。

可能为了保持自身的特权地位,而牺牲地区一体化的利益。<sup>①</sup>

### (三)多样化的全球比较研究

随着对欧洲一体化作为比较主体地位的质疑日益增多,以阿查亚、隆巴尔德(Philippe De Lombaerde)、索德鲍姆、博泽尔和里塞等为代表的一众学者努力打造一个比较地区主义研究新领域,大力倡导摆脱“欧盟中心主义”的旧观念,使用比较分析方法研究遍及全球各个地区的地区合作与地区一体化现象,尤其是全球南方的地区化现象。<sup>②</sup>

其实,早在新地区主义研究时期,就有学者从全球南方地区主义视角出发,对发展中地区的地区合作开展了比较案例研究和分析。<sup>③</sup> 进入 21 世纪,学术界在将视野扩展至欧盟以外地区后,对全球南方地区化现象的比较研究显得更为开阔。既有对同一地区的地区性机构进行的比较,以此研究全球南方地区组织的发展轨迹,以增进人们对所比较的地区组织的了解;<sup>④</sup>也有成果比较两个全球南方地区组织或地区机构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归纳影响它们不同发展轨迹差异的因素;<sup>⑤</sup>更有著述比较两个全球南方地区组织在某个领域的绩效,<sup>⑥</sup>并试图在比较后归纳影响绩效差异的原因。<sup>⑦</sup> 中国学者也逐步开展了规范性的比较研究,例如,邢瑞磊对欧洲和东亚地区主义进行

<sup>①</sup> Sebastian Krapohl, Katharina L. Meissner and Johannes Muntschick, “Regional Powers as Leaders or Rambos? The Ambivalent Behaviour of Brazil and South Africa in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52, No.4, 2014, pp.879–895; Sebastian Krapohl, “Two Logics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the Games Regional Actors Play,” in Sebastian Krapohl, ed.,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the Global South: External Influence on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ASEAN, MERCOSUR and SADC*,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pp.33–62.

<sup>②</sup> 耿协峰:《导读:比较地区主义的研究议程与未来挑战》,载[德]塔尼娅·A.博泽尔、[德]托马斯·里塞主编:《牛津比较地区主义手册》,第6–21页。

<sup>③</sup> 例如,阿克斯林(Andrew Axline)早在1994年就基于依附理论(dependence theory)考察了安第斯条约组织、东盟、加勒比委员会(Caribbean Commission)以及南太平洋论坛这四个全球南方的地区案例,深入探讨了国家利益如何塑造地区一体化的进程,并运用比较案例研究方法,细致分析了不同地区在规模、人口、发展水平以及组织起源等方面的异同。他指出,发展中国家在追求地区合作时,目标可能并非局限于正式的一体化,而可能倾向于其他形式的发展政策。这一观点十分具有前瞻性,因为在后来许多对全球南方地区组织的研究中,学者们纷纷指出,虽然某些地区主义力图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但经济相互依赖并非全球南方地区主义的普遍特征,超国家一体化也并非全球南方普遍采用或最为理想的模式。W. Andrew Axline, 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Comparative Case Studies*, 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sup>④</sup> Gian Luca Gardini, *The Origins of Mercosur: Democracy and Regionalization in South America*,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Nand C. Bardouille, “Caribbean Regionalisms in a Comparative–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Making of Four Regional Systems,” pp.171–211.

<sup>⑤</sup> Frank Mattheis, *New Regionalism in the South: Mercosur and SADC in a Comparative and Interregional Perspective*, Leipziger Universitätsverlag, 2014; Jürgen Rüland and Karsten Bechle, “Defending State–Centric Regionalism Through Mimicry and Localisation: Regional Parliamentary Bodies in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and Mercosu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Vol.17, No.1, 2014, pp.61–88.

<sup>⑥</sup> Rodrigo Tavares, “The Participation of SADC and ECOWAS in Military Operations: The Weight of National Interests in Decision–Making,” *African Studies Review*, Vol.54, No.2, 2011, pp.145–176; Aarie Glas and Emmanuel Balogun, “Norms in Practice: People–Centric Governance in ASEAN and ECOWA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6, No.4, 2020, pp.1015–1032.

<sup>⑦</sup> Haroldo Ramanzini Júnior and Bruno Theodoro Luciano, “Regionalism in the Global South: Mercosur and ECOWAS in Trade and Democracy Protection,” pp.1498–1517.

的“比较历史分析”,张云对欧洲、北美和东亚的区域治理以及郑先武对印度和印尼的区域治理角色分别进行的“比较案例分析”,韩彩珍等对欧盟与东盟制度化差异原因进行的“比较制度分析”等。<sup>①</sup>

源自全球南方的经验洞察,为比较地区主义的比较指标构建提供了新颖视角。学者们不再仅限于比较“主权”的整合程度和方式(如欧盟那样要么“共享”,要么“委托”),而更倾向于构建更具有情境性和系统性的比较指标,以便对不同地区的案例进行比较分析。阿查亚与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率先垂范,提出了地区制度设计的5个主要比较指标,即成员资格、地理范围、正式规则、规范及授权程度。<sup>②</sup>为避免忽视制度以外其他关键维度,马蒂斯(Frank Mattheis)等的视野从地区制度放大到整个地区,结合了旧地区主义和新地区主义过往比较研究的要素,设计了含有“地区化过程、地区制度设计、地区领导力、成员资格、主权让渡方式、一体化驱动因素、地区认同类型”这7个指标的地区实证比较研究框架,说明非洲与欧洲在地区主义的实践和逻辑上存在显著差异。<sup>③</sup>小拉曼齐尼(Haroldo Ramanzini Júnior)和卢西亚诺(Bruno Theodoro Luciano)两位南美学者结合上述指标,并考虑到研究案例——南美国家联盟国防委员会与非盟和平安全理事会在安全与防务领域的共性和差异——的具体背景,也设计了7个比较指标。<sup>④</sup>2020年,他们又结合贸易和民主问题,设计了6个指标用以讨论南共市和西共体在贸易和民主问题上的绩效比较,以了解它们之间的差异和相似之处,并指出,制度设计和地区领导力是解释这两个组织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绩效差异的原因。<sup>⑤</sup>阿戈斯蒂尼(Giovanni Agostinis)等则比较了中美洲一体化体系和南美国家联盟的地区卫生治理模式,并将国家能力与地区领导力这两个比较指标进一步细

① 邢瑞磊:《比较地区主义:概念与理论演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张云:《国际关系中的区域治理:理论建构与比较分析》,第186-203页;郑先武:《区域大国区域安全治理的多重角色——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案例比较分析》,载《国际观察》,2019年第5期,第122-156页;韩彩珍、肖一芳:《欧盟与东盟当前制度化发展差异的原因分析:基于交易成本视角》,载《东南亚纵横》,2020年第2期,第42-53页。

② Amitav Acharya and Alastair Iain Johnston, eds., *Crafting Cooperation: Regional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③ Lorenzo Fioramonti and Frank Mattheis, “Is Africa Really Following Europe? An Integrated Framework for Comparative Regionalism,”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54, No.3, 2016, pp.674-690.

④ 7个指标是:制度设计、经济相互依赖性、安全和防务理念、机构交叠、地区领导者、区外行为体的作用以及国家干预和民主保护的机制。参见 Haroldo Ramanzini Júnior and Bruno Theodoro Luciano,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Regionalism in the Global South: The Security and Defence Dimension of Unasur and the African Union,”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25, No.2, 2018, pp.239-261.

⑤ 6个指标是:制度设计、贸易方面的地区领导、民主保护方面的地区领导、经济相互依赖(地区内出口量)、地区外贸易议程(与地区外国家/集团签署的贸易协议数量)、民主保护机制。参见 Haroldo Ramanzini Júnior and Bruno Theodoro Luciano, “Regionalism in the Global South: MERCOSUR and ECOWAS in Trade and Democracy Protection,” pp.1498-1517.

化,以解释各国共同应对不同地区公共卫生挑战时的差异。<sup>①</sup>

当然,在这一时期,学者们也不会浪费欧盟这一具有丰富研究魅力的资源和“试验场”。在学术界转向以全球南方地区为主体的比较研究后,欧盟似乎具有了三种身份:一是比较主体之一。这种身份存在于仍使用“欧盟 vs 全球南方某个地区组织”比较模式进行的研究中,欧盟仍是两个比较主体中的一个,只不过成了“配角”,相关研究的重心更倾向于另一个比较主体,即全球南方某个地区组织。在这种模式的比较中,“目的论偏见”不再存在,欧盟只是“世界上众多地区组织中的一员”,所得到的结论往往突出的是全球南方某个地区组织的特殊性。<sup>②</sup>二是作为比较指标而存在。这常见于设置了指标的比较框架中,欧盟作为那个“区外因素”或者“区外行为体”指标,服务于对全球南方地区组织之间的更细致比较。例如,有研究发现,在区外行为体(欧盟)的作用下,非盟比南美国家联盟更有资源支持地区安全防务行动;或比较与欧盟签署的协议数量,发现南共市相较于西共体更多地参与对外贸易谈判。<sup>③</sup>三是成为比较的中介。这种身份常见于地区间比较研究,即比较欧盟与全球南方地区组织的地区间关系,形成“北—南”对比“北—南”的地区间合作比较(N-S vs N-S),如“欧盟—东盟 vs 欧盟—南共市”;<sup>④</sup>或者更进一步,形成“北—南”对比“南—南”的地区间合作比较(N-S vs S-S),如将欧盟同非洲、拉美的相互合作与拉丁美洲同非洲、阿拉伯的相互合作进行对比,进一步观察地区间合作的效用及影响地区间合作的因素。<sup>⑤</sup>

这些指标发展与案例研究的背后,是学者们从多样性的经验或实践中找寻共通性的尝试,无论是“制度设计”“地区领导力”抑或“区外因素”等指标要素,均可看出学者们试图将研究对象“地区主义”细化为更具体的元素进行研究,而通过这种细化,欧

---

<sup>①</sup> Giovanni Agostinis and Kevin Parthenay, “Exploring the Determinants of Regional Health Governance Modes in the Global South: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entral and South Americ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47, No.4, 2021, pp.399-421. 作者认为,国家能力可进一步细化为:资源、国家的存在、官僚体系的质量和授权的连贯性,符合公共卫生领域的资源(国家为其民众提供公共卫生服务的可支配资源)以及国家的存在(一个国家渗透其周边的社会和领土的基础设施能力)。地区领导力则包括:承担领导成本的能力(提供地区公共产品以及推动地区制度建设和政策制定)及意愿、说服邻国支持集体行动的能力(是否有其他国家的追随)。

<sup>②</sup> Friedrich Plank, *Evaluating the Africa-EU Partnership on Peace and Security: Interregional Cooperation in Peace Operations*, Palgrave Macmillan, 2022.

<sup>③</sup> Haroldo Ramanzini Júnior and Bruno Theodoro Luciano,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Regionalism in the Global South: The Security and Defence Dimension of Unasur and the African Union,” pp.239-261; Haroldo Ramanzini Júnior and Bruno Theodoro Luciano, “Regionalism in the Global South: MERCOSUR and ECOWAS in Trade and Democracy Protection,” pp.1498-1517.

<sup>④</sup> Frank Mattheis and Uwe Wunderlich, “Regional Actorness and Interregional Relations: ASEAN, the EU and Mercosur,” *Journa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Vol.39, No.6, 2017, pp.723-738.

<sup>⑤</sup> Andrés Litsegård and Frank Mattheis, “Broadening the Concept of Interregionalism: Beyond State-Centrism and Eurocentrism,”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45, No.7, 2024, pp.1273-1290.

盟也不再被视为特殊案例。以地区安全治理为例,当前的地区安全治理比较研究,并不只是单纯将地区安全治理机制两两比较。相反,研究的重点转到更普适的问题上,例如地区安全架构的设计逻辑、有效性及其影响,同时还探讨了不同安全治理机制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交叉关系。<sup>①</sup>

不仅在概念定性上进行细化,而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与数据可访问性的提高,许多学者围绕制度设计、具体政策领域等展开数据收集,将上述指标要素,从概念转变为具体化、可操作化的定量评估。如耶茨奇克在2021年建立了“地区组织相似性指数”(ROSI),以衡量地区机构之间的相似性;潘珂(Diana Panke)开发了“地区组织能力数据库”(ROCO),以探讨影响地区组织发展轨迹差异的因素。<sup>②</sup>另外,亨内伯格(Ingo Henneberg)开发了“非洲地区组织安全活动数据集”(ROSADA),以考察1997—2016年间非洲24个地区组织在冲突管理任务中的表现。<sup>③</sup>尤需一提的是,联合国大学比较地区一体化研究院(UNU-CRIS)的隆巴尔团队在地区一体化指标研究领域深耕近20年,成功开发了开源的“地区一体化指标体系”(SIRI)。这一指标体系从最初的单一经济维度已拓展到如今包含环境、社会、数字等多个维度的综合系统。此外,该体系能够根据各个地区的特定情况调整指标权重。例如,东盟关注供应链韧性指标,非洲侧重基础设施互联,而欧盟强调环境政策协同。<sup>④</sup>而这一演变过程体现出,地区主义研究的比较指标实现了从粗放到更为情境化、精细化、科学化的转变,且不断推动着理论与实践的创新融合。

① 这也表明,地区安全治理的研究正在向更加综合和全球化的方向发展。参见[以色列]阿里·卡佐维奇、[以色列]加利亚·普雷斯-巴纳森:《地区安全治理》,载[德]塔尼娅·A.博泽尔、[德]托马斯·里塞主编:《牛津比较地区主义手册》,第285-301页;Amandine Gnanouénon and Stephanie C. Hofmann, “Reg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Philippe De Lombaerde, ed., *Handbook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Integration*,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24, pp.164-181.

② Diana Panke and Anna Starkmann, “Trajectories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Comparative European Politics*, Vol.19, No.1, 2021, pp.1-25.

③ Ingo Henneberg, “Local Hero? Introducing the Regional Organisations Security Activity Dataset for Africa (ROSADA),”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29, No.2, 2022, pp.161-185.

④ 早在2004年时,该团队便着重探讨构建“地区一体化指标体系”(SIRI)的必要性,当时的研究以巴拉萨的经济一体化阶段理论为基础,聚焦贸易、投资和货币政策协调,依赖关税、贸易流量等传统指标。在2012年左右,他们又在“地区一体化指标体系”(SIRI)中引入“制度一体化”与“实际一体化”的区分,强调政策执行与市场互动的差异。直至2024年,“地区一体化指标体系”(SIRI)已从早期聚焦经济与政治维度的静态指标(贸易依存度、政策合规性),逐步拓展至涵盖环境可持续性(碳排放协同管理)、社会文化融合(地区身份认同)、数字联通(跨境光纤覆盖率)及危机韧性(疫情响应能力)等的多维动态指标体系,其研究方法也从依赖传统统计数据转向整合大数据与实时监测,并引入主成分分析(PCA)和稳健性检验以提升科学性。Philippe De Lombaerde and Luk Van Langenhove, “Indicators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Issues,” UNU-CRIS Occasional Papers, 2004; Philippe De Lombaerde et al., eds., *The Regional Integration Manual: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Methods*, Routledge, 2011; Philippe De Lombaerde, “Build Your Own Regional Integration Indicator System,” in Philippe De Lombaerde, ed., *Handbook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Integration*, pp.460-489.

总之,这一时期的比较研究呈现出显著的多样化特征,突破了传统以欧盟为模板的单一视角。学者们将研究范围扩展至全球南方,开展多维度比较;既有同一地区不同制度的纵向分析,也有地区间的横向比较;既有不同领域的专项研究,也有关注地区间互动的“北—南”或“南—南”合作对比等。在此期间,欧盟的角色亦从“黄金标准”转型为多元身份——或作为普通比较主体之一,或充当区外影响因素,或成为地区间合作的中介。

与此同时,随着地区比较研究的积累和创新,比较指标趋于系统化和情境化,推动比较研究迈向精细化。而通过构建这些可操作化的比较指标,减少了对单一案例的依赖,学者们主要针对不同政策领域进行细致分析,努力揭示不同地区在制度设计和执行上的差异。他们试图通过通用概念、理论框架以及科学严谨的比较设计,来深化和拓展研究的范围,这不仅消解了“目的论偏见”,更通过多案例、多层次、多方法的综合分析,构建起更具包容性与解释力的全球性地区主义比较研究。

## 五 结论

综合来看,全球南方地区主义研究的学术成长与理论进展,具有如下鲜明的特点。

首先,运用于全球南方的地区主义研究是一个充满波折和渐进的过程。从最开始对欧洲一体化理论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进行尝试性运用,尔后趋于理性选择,在对欧洲一体化理论的引进和使用上越来越多地采取“扬弃”态度,尽力使理论本土化。由此可见,即使在知识依附的情况下,全球南方作为所谓“边缘”对“中心”知识的汲取,仍然是有选择性的。欧美学者虽贡献了理论视角(政府间主义、新功能主义),但全球南方本土学者通过实证研究揭示:机械地移植欧洲一体化理论模式(超国家主义)到南方实践时,往往因忽视本土政治经济结构、历史传统与全球化压力等而陷入“水土不服”。对于全球南方地区主义而言,最终目标(或因变量)不是带有一定程度超国家主义发展含义的“一体化”,而是基于维护国家主权的“自主性”。追求自主性意味着优先发展地区内部规范和集体立场,尽可能地减少地区内的相互干涉和外来干涉。<sup>①</sup>

其次,立足于全球南方本土经验而试图加以解释的地区主义研究得到不断创新与丰富。相比预设性的“演绎”,全球南方地区主义研究更多运用的理论方法是“归纳”。全球南方地区主义研究在理论路线上并不是机械照搬现有理论,不是“照着图纸去施

<sup>①</sup> [德]塔尼娅·A.博泽尔、[德]托马斯·里塞主编:《牛津比较地区主义手册》,第114页。

工”,而是对地区主义进程中的特殊性不断进行总结和提炼。在这一过程中,全球南方本土学者发挥了卓著的贡献,他们不仅深入挖掘本土地区主义的历史根源、文化特质和社会结构,还积极构建适应本土实际情况的理论概念与框架。也正因如此,全球南方地区主义的许多理论概念映射出特定地区发展进程的独特形态,如非洲的“影子地区主义”、亚洲和拉美的“开放的地区主义”、拉美的“后霸权地区主义”等。

与此同时,南方地区对自治、发展和主权的追求,也使得这些立足本土性的研究超越纯粹解决功能问题的范畴,更加突出社会化要素和地区认同(地区性)构建的重要性,更多地关注地区内部的建构力量。在此背景下,相关研究不仅丰富了地区主义的理论构建,而且促进了不同地区主义研究之间的对话,从而突出了来自全球南方的知识生产的重要性。

最后,对比于全球南方而进行的地区主义比较研究,经历了“模型化——模板化——多样化”的转变,不仅欧盟的角色因此发生了转变,全球南方地区自身也从比较的客体转变为主体,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并且,随着全球南方内部跨区域交流的日益频繁,学者们开始关注并研究全球南方内部不同地区间的共性与差异,进一步丰富了全球南方地区主义的内涵。

正如最近伦茨(Tobias Lenz)和索德鲍姆共同撰文指出,比较地区主义研究不再受制于“欧盟 vs 全球南方”比较的窠臼,而是逐渐从对地区主义的整体性考察,转向围绕“治理”“制度设计”和“组织权威”等社会科学核心概念而设计新的研究框架,构建更具普适性的理论体系。<sup>①</sup>当前地区主义研究中已出现三大“静悄悄”的转型:(1)概念上,学者们日益将地区主义解构为具体组成部分,如单项政策、治理机制、规范或制度,使系统比较更易操作且减少个案中心主义倾向;(2)理论上,学者们积极构建基于社会科学普遍理论的框架体系,主动质疑并试图突破“欧盟中心主义”和“一体化势利眼”,同时力避因过分批判欧盟而陷入新的“区域中心主义”(Area Centricity);(3)方法论上,学者们运用更为严谨的比较研究设计,充分利用近期“数据革命”产生的新实证材料(比如地区组织数据集)。他们同时指出,这些转型意味着欧盟正日益融入真正意义上的比较研究议程,同时也表明,欧盟与世界其他地区主义之间的鸿沟已不再是比较地区主义研究的决定性特征。<sup>②</sup>

<sup>①</sup> Tobias Lenz and Fredrik Söderbaum, “Comparative Regionalism Beyond Europe Versus the Rest”.

<sup>②</sup> Tobias Lenz and Fredrik Söderbaum, “Comparative Regionalism Beyond Europe Versus the Rest”; Tobias Lenz and Fred Söderbaum,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mparative Regionalism,” UNU-CRIS Insight Brief, No.4, 2025, [https://cris.unu.edu/sites/cris.unu.edu/files/UNU-CRIS\\_Insight-Brief\\_25.04\\_Soderbaum\\_Lenz.pdf](https://cris.unu.edu/sites/cris.unu.edu/files/UNU-CRIS_Insight-Brief_25.04_Soderbaum_Lenz.pdf).

由此可见,地区主义的比较研究正基于普适性的社会科学理论和一般化的概念,构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比较分析框架。不仅欧盟逐渐被纳入这一框架,并且基于普遍的社会科学逻辑(制度有效性、自主性等)展开跨区域对话,构建去中心化的知识生产体系,更通过标准化指标设计促进学术对话,使研究成果与比较政治学、国际组织理论等领域形成交叉。这不仅有助于推动全球南方地区主义研究的更深入发展,也为地区主义的全球比较研究注入了新活力。

总体而言,无论是“运用于”“立足于”还是“对比于”全球南方的地区主义研究,其成长历程和理论进展均具有显著的超越“欧盟中心主义”色彩。在全球南方地区,欧洲一体化理论的传播和接受显然经历了从中心走向边缘、地区自主性意识觉醒以及理论本土化努力持续取得成功的过程。不过,这一过程并非线性发展,而是有着起伏和曲折的过程。欧洲一体化理论对于全球南方地区主义的解释力,在不同历史时期虽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但人们对其普遍性价值始终存疑。相对而言,全球南方地区主义研究已经成功地走上了自主发展的道路,其知识生产体系不断强化自主性和个性,专注于解释本地区的有关现象和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特色。此外,人们对多样性的全球地区主义比较越来越感兴趣,不仅重视比较欧盟模式与全球南方地区主义模式之间的异同,而且对于全球南方内部不同的地区主义模式,以及地区间主义和跨地区主义等现象,也已开展日益细致的比较研究。

展望未来,伴随着全球国际关系学(Global IR)的理论构建和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一种融合欧洲一体化研究和全球南方地区主义研究的“全球地区主义”(global regionalism)研究新领域,终将在世界学术舞台上闪亮登场,吸引更多中外学者的热切关注。

(作者简介:耿协峰,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教授;陈灵芝,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博士研究生。责任编辑:宋晓敏)